

ZHAIXIA
SHOUYUGUI
DEMIANJU

李复威 著

摘下兽与鬼的面具



摘下兽与鬼的面具
——当代文学论文集
李复威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3插页 215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9 000册

ISBN7—5059—1245—3/I·890 定价: 4.30元



1941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又在北京大学攻读当代文学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论著有《新时期小说的嬗变与拓展》（学苑出版社）、《新时期文学面面观》（福建教育出版社）《简明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出版社）等。

序

现实是属于瞬间性的，瞬间的结果及其无穷的积累，就变成了历史的绵绵存在。这个永恒的历史存在带给现实人以无尽无休阐释的可能性。常听人说，历史，永远是当代人眼睛里的历史。这句看来冒犯历史尊严的话，其实倒是透露出一个道理：对历史的阐释其目的是为了走出历史。如果当代人陷到历史的陈迹中拔不出脚，那就很难向前迈出步伐。当代人立足于什么基点上看历史呢？这个基点我想就是生存与发展。是以对现实的认识和对未来的预想为参照点来阐释历史的。这就产生了对历史的现实态度——当代人的眼光。

当代人的眼光也并不就是明镜高悬、一目了然的。由对现实的矛盾性和对未来预想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历史本身把握的真切程度，这就带来了对历史阐释的多种立论的并立交叉和科学性的不同区别。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是由“永远是当代人眼睛里的历史”本身造成的循环：不断出现的当代人眼光，使历史的阐释不存在一次性完成的可能。人类总是由后来的当代人评说过往的“当代人”，所以，“重写历史”、

“重写文学史”就成了人类的正常行为。什么时代出现了“不准重写”的状况，那个时代一定出现了异常的毛病。

李复威同志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就有“重写当代文学史”的性质，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十七年”时期文学评价的文章。还在七十年末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就产生了“重写”的欲望，他的学位论文《论当代普通人形象塑造的历史发展及艺术地位》，就体现了他的当代人的历史眼光。

“重写”的要求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要求。以往的历史观中有一个致命的颠倒，那就是以历史的典范作为现实的标准。其实人们心目中的典范都是为未来设计的。一旦人们觉醒到现实的目标是未来的时候，人们也就纷纷怀疑和重新审视那些历史典范，于是重写历史或文学史的行动就出现了。

重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对历史本身的真切把握（包括对历史环境和历史事实的掌握）和对现实发展趋势的深刻理解，把这两者统一成为“当代人的眼光”时，重写和阐释才可能产生时代的意义。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十七年”与“文革”两个历史时期的重写与新写，就是因为当代人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眼光，已经可以从历史演变的总体把握中和从现实发展的新启悟中，达到一种新认识，写出一部具有当代人眼光的文学史来。

再回到“走出历史”的话题上来。

不仅“十七年”和“文革”那段历史要走出来，八十年代这段转瞬已过的历史也应该走出来了。

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是一个比较容易突破、比较容易创新、比较容易探索、比较容易模仿，也是比较容易轰动的时期。客观的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还处在一个比较容易的层次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文学的起点太低，到处是禁区，所以很容易突破，老手法老模式，所以很容易创新，不存在什么探索，所以一探索就打响，遍地的社会问题，所以一触及就轰动。在这种形势下，社会给予文学的期望与优惠也很特殊，一篇作品打响就可以使作者成名，社会地位也可以随之改观。

在迈向九十年代和下一个世纪的时候，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有人感叹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有人悲哀文学从马路中央被挤到不起眼的角落里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确实扮演着社会代言人的重要角色，积郁已久的社会情绪通过文学这条渠道向外渲泄，一时间文学成了救世主，甚至兼有检察官与法官的职能。在民主与法治不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文学的这种奇特作用是不难理解的，但这并不是文学的正常状态。一旦社会舆论的多种渠道打通之后，文学被当作易于引起轰动社会舆论的角色就会逐渐淡化了。

现在，文学的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都在改变。从外部条件来看，在社会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的运转过程中，文学的社会名次显然后移了，文学在社会上的审美职能将会突出出来，当然也使他具有精神消费品的性质，作家将从被封为“灵魂工程师”的尊位上还原为普通的社会成员。这难免使作家们产生失落感。从内部条件看，文学已经越过了比较容易

的层次，在经过了十年的闯荡和游历之后，孕育着独立操作的渴望，要把自身的经历上升为更高理性阶段，走上真正独创性的艰难历程。

中国作家不能停留在经验阶段而应发扬想象力和创造力，以想象力和创造力重铸经验，那才是文学创造的高境界。当然，想象力与创造力需要借助于人类创造的既有经验作为出发点，那种以迟到者的心态扫荡一切以突出自己的方式，并不是真正的创造，那是回到原始野蛮人的出发点，在现代文明世界里可能成为文化怪物。

本来我们的精神丧失已经太多，这十年的文学，大都在消耗着几乎丧失殆尽的精神躯体，无论是无节制的处于精神丧失的痛苦悲泣之中，或者是以玩世不恭所进行的精神游戏，同样都是一种精神丧失。与此相关的另一面，现在是需树立起精神支柱，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学说，形成支撑起新的历史进程的精神力量的时候了。

时代为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几千年来形成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思维观念中蜕变出来的大转变时期，挑战与机遇同时摆在作家面前，无疑，这是一个出现杰出文学的时代机会。

在历史转变的艰难历程中，伟大的杰出的作品，在现今的世界上，不可能是思想艺术都很单纯的作品，必定是那种含蓄了复杂的社会、人生的巨大矛盾以及创作主体的自身的巨大矛盾性的作品。因为，当今的世界被它自身的巨大矛盾

所笼罩，带给人类的是巨大的矛盾感。对这一巨大的矛盾感必然会被杰出的作家深刻地感悟到、体验到，并且加以艺术地呈现。本世纪出现的杰出作家无不是深刻地感悟到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巨大矛盾的巨大的精神个体。

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不同程度地体验到了社会和人自身存在的巨大矛盾的深刻性，反思，成了贯穿在八十年文学中的一股连绵不断的思潮，由现实社会，到历史文化，到人本的反思历程，已可窥见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运转轨迹。矛盾感知的深刻性与艺术呈现的创造性，是当代文学生命力的基础，并且由此可能产生杰作。

走出历史，获得未来！

张 钟

1989.3.1.于北大畅春园

目 录

序

张 钟

- 论当代普通人形象塑造的历史发展及艺术地位…………… (1)
- 关于当代文学反面形象塑造的思考…………… (42)
- 魂系中华…………… (58)
- 新时期文学民族性问题的思考
- 勇于向时代的纵深突进…………… (71)
- 文学反映当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职责
- 摘下兽与鬼的面具以后…………… (78)
- 近年来反面形象塑造的局限与失误
- 论心理失态表现的哲学思辨与艺术开拓…………… (90)
- 艺术在交叉路口的苦觅与追索…………… (103)
- 多样化：从芜杂走向和谐…………… (116)
- 小说创作中文体意识的自觉…………… (127)
- “心有灵犀一点通…”…………… (145)
-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八十年代观众
- 关于纪实小说的思考…………… (152)

关于文学“轰动效应”的讨论及思考·····	(161)
历史性的“转折”与美学上的“断裂”·····	(166)
——建国之初短篇小说创作的剖析	
凝聚着时代风云和历史教训的“警钟”·····	(181)
——梁建形象塑造的再探索	
引人瞩目的崛起·····	(195)
——当代中篇小说创作一瞥	
孕育着 成熟着·····	(209)
——当代文学流派及作家群问题谈片	
色泽纷呈 神采各异·····	(221)
——十七年时期著名短篇小说作家风格谈	
当代小说发展历程的一般性描述·····	(236)
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总体轮廓及艺术轨迹·····	(268)
旧梦重温中寻求美的真谛·····	(276)
——论汪曾祺创作的题材开拓与艺术信念	
一半是火的阴影 一半是海的沉沙·····	(289)
——评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别具一格的视角和情韵·····	(296)
——读何立伟的《白色鸟》	
平凡中显奇崛 淡泊中寄至味·····	(305)
——重读欧阳山的《乡下奇人》	
谈孙荪的散文《云赋》·····	(314)
“通俗史诗”文学的新探索·····	(324)
——评蒙古族作家孙书林的长篇小说《穹庐惊梦》	
后 记·····	(330)

论当代普通人形象塑造 的历史发展及艺术地位

这是一座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住在这里的几户普通的城市居民在十年浩劫中的悲欢离合，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正直、善良的人们怀着对幸福的向往和对光明的憧憬，在多难的生活中挣扎、同邪恶的势力作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的喜悦——这是话剧《左邻右舍》向我们展现出的一幅当代社会的缩影。普通的人，普通的事，紧紧地揪住了观众的心，激起人们出自肺腑的共鸣：叹息、惊异、扼腕、嗤笑、沉思……

这种现实主义艺术力量的显示，使人回想起三十年前老舍同志的名剧《龙须沟》。如果把《左邻右舍》的院落看做《龙须沟》杂院的继续的话，那么在这里所发生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当代普通人一段生活历史的缩影。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走过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我们的当代文学也随之经历了崎岖不平的历程。象这样真实地反映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这样深刻地倾吐普通人的心声，这样生动地塑造当代普通人形象的作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是太少了。

历史的偏向总是要由历史来纠正的。看看近几年我国新

时期短暂的文学历史，粗略巡视一下那色彩斑斓的人物形象的画廊，就十分清楚地看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当代普通人形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活跃在文学作品之中、活跃在文学主人公的行列之中。他们带着几分扬眉吐气的神态，带着时代所赋予的鲜明特色，带着作家们创造的姿态万千的艺术风采，分外地引人注目。这些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无疑已经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具有开拓意义的重要特点。

当代普通人形象的塑造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才取得了这样的艺术地位。这是一个得来不易的成果，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和总结的重要课题。听听一位作家的话吧：“这几年，我常想，究竟什么人是我们时代的脊梁呢？什么人应该活跃于舞台和银幕上呢？我的结论是普普通通的人民。他们头上没有光圈，身上没有法衣，手上没有号角和权杖，足下没有风火轮。他们有浑身的伤痕，内心的痛苦。他们口里也常有高声的牢骚，低声的叹息；他们背负着因袭和时弊的重担，然而他们内心又有光明圣洁的火焰，他们在咬着牙苦干。他们在创造我们的幸福，开辟我们的道路，他们是生活的主人。要写就写他们，要歌颂就歌颂他们。”^①这样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些作家通过自身经历和思考得出的结论，恐怕也是我国当代文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探寻到的一条艺术的真理。

本文拟就当代普通人形象塑造的兴衰变幻，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当代普通人形象在我们文学创作中应有的地位等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场冤案的启示

多年以来，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时，形成了一套习惯的用语：英雄人物、先进人物、正面人物、转变人物、落后人物、反面人物……对这种分类的依据、界限、内涵以及它是否准确等，过去是很少有人探究或质疑的。当前，在许多具有复杂经历和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面前，这些“标签”运用起来已经不能得心应手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那么，当代普通人究竟是指文学作品中的哪一类形象呢？

1964年，我国文艺界曾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批判了“中间人物”论，其矛头直接指向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邵荃麟等同志的意见和主张。关于这场冤案的是非曲直，已经有不少文章予以申诉和澄清，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左”倾文艺思潮的严重危害。

令人感兴趣的是，“中间人物”论受到了批判，而“中间人物”这个艺术形象的称呼却一直保留下来，沿用至今而不衰。然而，关于“中间人物”概念的具体含义的解释，则是众说纷纭、各用所需、差距颇大。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中间人物”的称呼，的确存在内涵上的不确定性和诠释上的主观随意性，显得不够科学和严谨。探讨一下邵荃麟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是会对我们有许多启发的。从目前的材料看来，提到“中间人物”大约有这样几种解释：

- 1.人们一提起“中间人物”往往引用“不好不坏、亦好

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②的说法来解释。这是沐阳同志当年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的，后来几乎成了“中间人物”的“定义”。这种解释的确是令人难以捉摸的，也并不是邵荃麟同志自己的用语。后来，这种提法简直成了“上纲时大逆不道的错言罪语，和日常间闲谈议论的讽刺笑料”。^③康濯同志公正地指出，这是批判所留下的“恶果”，那句话根本不是什么定义，“只不过以杂文笔法，把思想不太先进、也不太落后的这一大多数的中间状态的人物表露得有点形象罢了”。^④

2.从当时《文艺报》的批判专论来看，是从预定的批判调子出发。把“中间人物”称做是“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是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人，是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人，是充满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精神负担’的人。”^⑤这里所指的“中间人物”实际上是应该受到批判的落后人物。这是用人物的政治态度偷换了人物的思想状况，显然是歪曲了邵荃麟同志的原意的。

3.还有人认为，邵荃麟同志的“中间人物”是指“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外的各种各样的人物。”^⑥既包括了“接近正面人物”的人物，也包括了“明显的落后人物”。这样的解释就把范围扩展大了，但至少肯定了“中间人物”是包括了“落后人物”在内的。这也并不符合邵荃麟同志的原意。

4.有人把“中间人物”直接称呼做“成长中的人物”，认为他们是“我们生活中的多数”，“一个广阔的社会人群”，“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或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们工作着，一面克服自身的缺点，一面前进着。他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着重要作用。”^⑦这是颇有见地的看法。

5.那么，邵荃麟同志本人是怎样具体阐述的呢？他说：

“强调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况人物的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⑧——十分明显，这里所说的“中间状态的人物”就是指人民群众中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之间的、处于社会大多数的平常人、一般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普通人”。后来的一些批判者给他们扣上“中间人物”的帽子，把他们从整体上划归到政治上动摇的落后人物的范畴，那就不是邵荃麟同志所能负责的了。

不少人认为邵荃麟同志提出“中间人物”论的目的，是“提倡创作上人物的多样化”，是要求“题材范围的扩大”。笼统地说，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囊括提出“中间人物”的鲜明而具体的针对性。从当时我国的文学创作实际来看，邵荃麟同志的主张的确是切中时弊的。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当代英雄是大有人在的（尽管刻画上有许多的毛病），反面人物也为数不少（当然是有类型化、简单化的倾向），落后人物也不乏其人（而且往往还有点艺术的生动性）。那么，缺少的是哪种人呢？正是邵荃麟同志提出“中间人物”本意中所指的人民群众中大量存在的普通人形象。不仅如此，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也由于普通人的塑造对于多方面的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

盾，对于提高文学的现实主义水平，更广泛地发挥文学应有的职能，已经在当时处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我们既敬佩邵荃麟同志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也十分叹服他对文学创作时弊的精细的观察和深刻的剖析。

邵荃麟同志是为当代普通人形象塑造大声疾呼的一个人，但并不是最早和唯一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在此以前已经有一些同志陆续地呼吁过。早在1952年《文艺报》组织“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中就有人提出，在文艺创作中“认为既要创造英雄形象”，“就不能写中间分子或出现落后人物，这也是违反生活真实”的。^⑨1953年冯雪峰同志也提出，“广大的普通群众……什么时候都是实际生活中矛盾斗争的主体，而绝不是旁观者或两种力量之间的中介物”。他并且谈到“在实际生活中，所谓不好不坏的，看起来好象既不能加以肯定也不应该加以否定的”、“大量存在着的”人们，在艺术形象上“仍然也是重要的主人公”。^⑩秦兆阳同志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也谈到“那些写普通人和普通事的作品，如果写得具有深刻的真实性，具有作者的独创性，它也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同于一般的特异的色彩”。直到大连会议前夕，在有关茹志鹃作品的讨论中，也有人肯定作家的任务就在于描写那些“在改造中的社会里面的改造中的人”，“描写那种正在不同站头的‘里程’中前进着的人物，那种还在成长中的人物，又有什么不好呢？”^⑪邵荃麟同志的主张正是长时期以来，文艺创作上的这种客观现实和潜在要求的集中反映。

当代普通人——居我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千千万万普通的

工人、农民、战士和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日夜辛勤地劳动，为祖国和人民努力做出自己的一点微薄的贡献。虽然他们并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也总有些使人感到可敬和可爱的地方，虽然他们身上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还有旧传统、旧习惯留下来的因袭的包袱，但他们热爱生活、向往未来，从自己的不同的起点上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一个容量极大的社会人群。就其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而论，他们之间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随着生活的进程，他们也在不断地成长着、发展着、演变着……高尔基曾经以无限深情的口吻谈到这样的人：“我要向散布在我国各个边远角落，散布在草原和西伯利亚大森林、向高加索山区和北方冻土带的工厂、乡村里的这种渺小而又伟大的人，向有时很孤单的、在很难了解自己的人群中工作的人，向老老实实地做着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事情的国家工作者，致以真诚的敬礼，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同志！要知道并且相信，你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人。你从你的小事情做起，来创造着真正的新世界”。^⑫

这样的普通人为什么不应该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呢？这样的普通人形象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呢？

乖蹇的历史命运

塑造同时代的普通人形象，是过去时代中外进步的文学